

云南建水窑遗址湖广窑区发掘收获 及相关问题^{*}

丁 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助理教授)
戴宗品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王筱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博士研究生)
秦大树 (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 教授)

建水窑是云南地区最重要的陶瓷窑场之一。由于云南地区钴矿丰富,而建水窑青花瓷又与元明时期景德镇青花瓷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既往涉及建水窑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元明时期青花瓷的创烧及发展问题。实际上,近年来陶瓷研究的学术进展表明,建水窑的特色不只限于青花瓷产品,其时空坐标特殊、产品种类丰富,值得反复推敲。从地理空间来看,建水地处红河北岸、西南边疆,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交通要塞,是与越南红河流域展开瓷业交流的前沿阵地。从时间轴线来看,建水窑兴起于元明时期,彼时正是云南地区纳入中央直接管理、大量东来移民涌入的变革时期。而其产品,不只包括与景德镇及越南关系密切的青花瓷器,还有大量仿制龙泉窑和自成风格的青釉产品,呈现出复杂的面貌。由此而观,对建水窑进行研究,是探讨云南制瓷手工业发展史、元

明清时期青花瓷与青瓷生产格局、中国与东南亚瓷业交流等重大课题的关键环节。

一 以往考古工作与研究

对建水窑的调查和研究,始于云南青花瓷的发现。1955年,孙太初在报告云南西部大理、丽江、楚雄等地发现的火葬墓时,将火葬墓分为早、晚两期,其中早期年代为元初至明正统,同时将火葬墓中出土的青花玉壶春瓶及青瓷瓶标注为元代,但在行文中并未披露将火葬墓或出土器物判定为元代的证据^[1]。1957、1960年,马继武、葛季芳先后调查玉溪窑,发现玉溪窑出土青瓷和青花瓷^[2],但此次调查对玉溪窑产品年代的判断尚较模糊。20世纪60年代中期,葛季芳出于对建水紫陶的兴趣,曾赴建水窑踏查,随即发现了青花瓷片^[3],但囿于时间及条件,未发表报告。1976年,葛季芳等再度赴玉溪

^{*} 通讯作者为秦大树。

调查,其将玉溪采集到的青釉印花器与禄丰黑井出土的青釉印花残盘比较后认为二者胎釉、印花、造型基本相似,而后者伴出有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的圆形墓志,遂据此推断玉溪窑青花瓷时代下限不会晚于明代^[4]。基于这些研究成果,1980年,冯先铭将孙太初1955年披露的大理邓川出土青花瓷器与1973年出土于禄丰火葬墓的青花玉壶春瓶^[5]都归为玉溪窑元代产品,不过未对其年代展开论证^[6]。然而1982年,杨大申在多次调查建水窑后撰文指出,禄丰元代火葬墓所出青花玉壶春瓶等应为建水窑产品^[7]。

20世纪80年代,葛季芳再度至建水进行调查,并对个别断面进行了试掘。此次调查在碗窑区域展开,共发现窑址十多处,采集器物可分为青瓷和青花瓷两类,其中青瓷又可分为素面器、印花器、划花器三类。这些瓷器主要采用支钉叠烧法装烧。葛季芳重点介绍了旧窑、湖广窑、洪家窑、高堆窑、袁家窑5处窑址,指出湖广窑和高堆窑青釉、青花兼有。其对洪家窑断面进行了试掘,将堆积层分为两层:第一层以青釉为主,夹杂部分青釉印花青花器;第二层以青花为主,另有少量青釉印花、划花器。调查者判断此次调查的大部分窑址及器物时代属元代,除此之外还刊布了建水碗窑村圆通寺内一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奉本府清军府明文碑》的部分内容,其中涉及清代碗窑地区瓷业生产情况。此碑的发现对研究建水窑历史意义重大^[8]。

葛季芳对玉溪窑及建水窑青花瓷生产年代的判断,均基于对禄丰火葬墓出土青瓷及青花瓷的分析,其依据墓地所出元“泰定”年款墓志、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墓志与宣光九年(1379年)墓志^[9],判定墓地年代为元初至明初,又认为宣光九年墓所出青花狮子滚绣球罐可作为标准器^[10]。窑址调研及禄丰火葬墓研究构成了后来葛氏一系列研究的基础,其所获年代结论影响甚大。不过,细究葛氏原文论述可知,其并未对禄丰火葬墓遗物的发掘情况、共存关系进行详尽分析和报道,因此青花瓷和纪年墓

志究竟能否对应,早有质疑存在^[11]。

除葛季芳外,苏伏涛^[12]、张建农^[13]、陈丽琼^[14]等人也曾先后踏查建水碗窑村窑址,所刊调查资料详略有别,其对窑址的年代认识基本囿于葛氏框架,但亦关注到建水窑产品面貌和生产工艺上的一些特色,如陈丽琼等指出,建水窑产品中存在仿龙泉青瓷的现象。

1987年,建水县城北门主道北正街改拓时,显现0.4~0.5米厚的瓷片夹层,张建农对这一地点进行了调查。据其描述,瓷片夹层下的生土层所含黏土,实为较好的陶瓷原料^[15]。由此推测,不排除这一地点为建水碗窑村之外的另一处窑址的可能性。

除窑址调查外,建水窑产品广见于云南地区的墓葬、遗址中^[16]。这些遗物的发现丰富了建水窑产品的文化面貌,为研究建水窑的生产工艺提供了线索。但是,这些墓葬、遗址往往缺乏纪年材料,无法为建水窑产品的年代提供更多佐证。从研究情况来看,研究者显然更关注建水窑出产的青花瓷产品。2007年,中国古陶瓷学会在昆明召开“云南青花暨边疆地区青花学术研讨会”^[17],后会议论文结集成册^[18]。会议主题反映出青花瓷是云南陶瓷研究重点对象,在年代、文化面貌、生产工艺三大主题中,年代问题是探讨的焦点。与会者对云南青花的创烧提出“元代说”“元末明初说”“明代说”三种意见,并有研究者由此延伸出相应的分期观点。研究者对于建水窑年代及分期的看法,从属于对云南青花瓷时代的探讨。

在持“明代说”的研究者中,施静菲在充分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云南青花瓷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与前人研究不同,施静菲并未因青花瓷而将云南陶瓷的生产完全归因于与景德镇的联系,而是将窑址所见的青瓷和青花瓷联系起来,认为云南青花瓷的生产是基于自身已经形成的青瓷烧制工艺,其虽吸收了景德镇青花瓷的纹饰风格和器形,但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并非景德镇青花系统传入后才产生的一个地方支系。在年代问题上,她基于出土材料和传世材料器形、纹饰的比对,将云南青花

瓷的发展序列归纳为三期,认为云南青花瓷的早期类型相比“至正型青花”更具有“洪武样式”的特征,创烧时间应不早于明洪武晚期,而后生产延续至万历年间^[19]。

以往的考古调查明确了建水窑遗址的地点和大体范围。研究者以窑址调查、墓葬、居址出土陶瓷及馆藏文物为基础,在年代分期、文化面貌、生产工艺、传播交流等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不过,从基础材料来看,窑址调查采集的材料缺少有效的序列信息,而墓葬、居址等陶瓷消费地所见的材料又无法充分反映陶瓷生产环节,相较而言,多数传世品的背景信息更为匮乏,这些材料的局限性使得建水窑生产的总体面貌及发展情况难以充分展现。通过窑址发掘获得具有可靠有序的地层序列的资料,对于探索建水窑的生产历史意义重大。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建水碗窑村窑址进行了主动发掘。经调查获知,至今碗窑村内地表可见的不同时代窑址尚有19处,其中湖广窑、洪家窑在前人研究中屡被提及,且地表遗物丰富,保存状况较好。因此,这两处地点被列为此次发掘的重点区域。在对湖广窑区的发掘中获得了序列清楚的地层堆积和丰富遗存。通过对这些考古成果的初步整理,或可为进一步全面认识建水窑的生产特色和文化面貌奠定基础。

二 建水碗窑村湖广窑区各期的主要收获与相关问题

“湖广窑”这一名称,与碗窑村内的洪家窑、何家窑等绝大多数以家族姓氏命名的窑名颇不相同。葛季芳指出,“建水窑群中的湖广窑,当地群众无不说是湖、广人来这里建窑烧造的”^[20]。施静菲指出,湖广窑的窑名,可能是由元代入云南的湖广人带来窑业技术所致^[21]。由此而观,湖广窑可能是云南瓷业本地因素与外来因素碰撞、结合的关键地点之一。

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演化情况,可暂将湖广窑文化层分为两组,进而将湖广窑遗

存分为两期^[22]。本文结合各期典型堆积单位统计数据,对湖广窑区的生产历程和出土遗物演化规律进行总结。

(一)第一期:明早期

第一组地层单位对应第一期。这组单位以三号窑炉(Y3)为中心。Y3开口于探方T19的第5层下,这一地层相当于探方T20的第6层。T19第5层出土的少量器物与其叠压的下层堆积近似,可能是Y3废弃阶段形成的堆积,因此此层及其以下堆积单位皆可视为Y3或与Y3同期窑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窑业堆积层,为湖广窑区最早的一组地层单位。

在第一组堆积单位中,7号灰坑(T21H7)是发掘区最早的遗迹单位,该灰坑开口于探方T21第11层(T21⑪)下,系在黄白色生土上掘出,据当地紫陶生产从业者辨认,这类致密的黄白色黏土是一种瓷土。T21H7出土瓷器的器类、器形、胎釉质地和纹饰风格与T21⑪、T20⑪一致,并且T21H7与T21⑪有4件器物拼合,说明灰坑使用的时间不长,且废弃填埋的时间与T21⑪的形成时间非常接近。综合以上信息,我们推测T21H7是一处窑址生产前使用的瓷土矿坑,在窑业生产开始后,很快被废弃,并用窑业废弃物填埋。另外,本区内发掘至底的探方,所见生土均为上述瓷土,这表明湖广窑这一生产地点的选取很可能与原料密切相关,其应是就地取土进行生产的窑场。

第一期纳入统计的陶瓷遗物标本总计约27071件(片),其中淡青釉瓷(89%)占比最高,其次为青花瓷(9%),有少量素胎瓷(1%),最末为仿龙泉青釉、酱釉、复合釉瓷(共计1%)。

青花瓷的器类包括盘(56%)、碗(19%)、瓶(13%)、罐(5%)、高足杯(4%)、炉、壶、盆、钵、研钵、研臼、器盖、碟、器座、盒、烛台等(共计3%)。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盘和碗,盘类在第一期绝大多数地层中占比过半。器形方面,青花盘中,折沿盘数量最多,器形与龙泉窑青釉折沿盘相似(如标本T21H7②:11)。青花碗类以侈口居多(60.9%),曲腹相对较深,器壁最厚处在腹下部近底处,整体造型敦实稳重(如标本

T21H7②:29、T20⑪:3)。青花玉壶春瓶颈部细而内束,最大径在腹下部,整体重心靠下。一些器形仅见于第一期,在其他明早期的墓葬和遗存中常成组出现^[2],如曲腹平底瓶(如标本 T20⑪:10,图一)、立耳三足炉(如标本 T21H7①:2、T21H7①:1)、筒形炉(如标本 T21⑨:5)、折腹碗(如标本 T21H7③:9)、高足杯(如标本 T21⑪:13)。

青花瓷纹饰层次多且分明,花卉类主体纹饰的图式结构完整,笔触细致流畅,青花呈浓郁的灰蓝色或深灰绿色。人物纹和凤鸟纹等较复杂的主体纹饰在瓶、高足杯、罐、碗等多种器类上出现,构图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器内外表面,显示出较熟练的绘工。玉壶春瓶的纹饰自内口沿至颈、肩、腹、胫部,可分为五层,层次最丰富,肩部和腹部的主体纹饰常见一束莲、鱼藻纹,与折沿盘的主体纹饰一致。盘类流行内底一束莲、双鱼纹与内壁五枚一组的水草、蕉叶纹的固定组合,边饰流行水波纹和回纹。碗类外壁常分为上、下两层,腹上部饰以缠枝花卉纹,胫部饰以莲瓣纹,花卉的叶多抽象为葫芦形的小叶或掌形的大叶,常与莲花、菊花、牡丹和五瓣的简笔花卉形成不固定的组合。器物近足处的莲瓣纹有三类:第一类为近方形的变体仰莲瓣纹,内部填绘螺旋形卷云纹或留白的如意云头纹;第二类为瓣中略内凹的莲瓣纹,边缘留白,内部涂青;第三类莲瓣略尖,近心形,填涂方式同第二类。第一类多见于瓶、罐和大碗的胫部,后两类多见于高足杯的胫部和足

上部,少量饰于觚形瓶肩部和荷叶罐的盖顶。少量的麒麟纹多与海水纹组合出现(如标本 T21H7②:27、T21⑪:20),此类纹饰受到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影响较显著,但外底施酱色护胎汁,又是仅见于红河流域滇东南和越南北部的特殊工艺。青花菊花纹的花心常绘以螺旋形(如标本 T21H7②:29、T21H7②:3,图二),而贴塑缠枝菊纹罐(如标本 T14⑦:59)的花心又以格纹表现。

淡青釉瓷的器类包括瓶罐类(51%)、罐(20%)、瓶(16%)、壶(7%)、盆、研钵、盘、碗、研臼、瓮、炉、缸、盒、杯、器座、器盖(共计6%)等^[24]。第一期淡青釉占比最多的是瓶、罐两类,其中淡青釉盘口长颈瓶与淡青釉罐的腹部、底部残片难以区分,因此统一归为瓶罐类残片,但可识别的瓶、罐残片数量仍然表明,这两类器物的产量是最大的。器形方面,淡青釉罐口沿多外卷,有高直领和矮领两类,肩部丰满,腹部较斜直。淡青釉盘口长颈瓶的口沿转折较分明,有的外口沿上下会修出两道锐利的棱,甚至将下方的棱捏成荷叶花边状。此期淡青釉盆多为体形较小的圆唇曲腹盆,这类盆与研钵的形态接近,主要区别在于研钵内壁不施釉,口沿多捏成一流,部分研钵内壁有篦划细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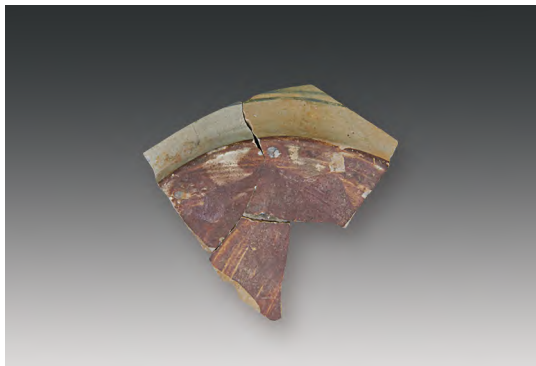
从修坯情况来看,第一期的器物修胎普遍较为精细。圈足的足墙较高且直,足底修棱痕较窄,多将外底心凸起处修平,如第一期青花侈口曲腹圈足碗(T21H7②:29),外底有反复修坯留下的大量旋痕。即便是器物外底这类使



图一 青花曲腹平底瓶(T20⑪:10)



图二 青花器盖(T21H7②:3)



图三 青花平底盆底部残片(T21⑩:20)

用时处于视觉盲区的部位,第一期的修坯工艺仍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是精工细作的体现。第二期的器物修足粗率,圈足变得非常低矮,足墙外壁和外底心的凸起往往不作修整,挖足多偏离圆心。

由胎釉而观,第一期器物胎质普遍较细。青花瓷中数量最多的折沿盘类釉色略泛灰,施釉不及足墙,而大碗、瓶、罐、炉、高足杯等较精致的器物釉色多青中泛白,施釉及足,足底刮釉。第一期青花瓷、淡青釉瓷的釉面均密布小气泡,略失透,釉质整体具有莹润的质感。第二期器物胎质普遍较粗,但胎体的烧结程度更好,质地粗而坚致。釉色泛灰绿或黄褐,但釉面普遍较光亮,具有玻璃质感。此次发掘出土瓷器外底绝大多数不施釉,但第一期会在部分青花瓷外底涂刷酱色护胎釉,即此前部分学者所称“巧克力底”(图三)^[25]。目前所见施酱色釉的器类包括侈口盘、敞口盘、敞口花口曲腹圈足大碗、敞口斜曲腹碗、玉壶春瓶、高足杯,但这些器类中涂刷酱色釉的数量并不多。

(二)第二期:明中晚期至清末

第二组地层单位对应第二期。从地层堆积情况来看,第二组地层的大多数堆积单位实为围绕二号窑炉(Y2)而形成的窑业垃圾层。需要说明的是,Y2最外层北侧护窑墙建筑于探方T20第5层,这表明第5层形成于Y3废弃后,Y2最后一次翻修前,由此T20第5层或可视为一个单独的部分。不过考虑到Y2曾经过翻修,且第5层出土器物形态与其上堆积单位近似,

因此暂将第5层并入其上堆积单位。

Y2、Y3虽均被推测为龙窑,但建筑方式及形制差别极大,代表了湖广窑区不同时期的窑炉技术。Y2的形制特征,与碗窑村村中现存龙窑接近,其护窑墙所用罐、盆延烧时间极长,因此,其年代下限不易确定。目前暂将其时代划为明中晚期至清末。待建水窑其他地点2020年发掘资料整理完成后,此期段或可进一步细化。

第二期纳入统计的陶瓷遗物标本总计约16876件(片),其中最多的依旧为淡青釉瓷(86%),青花瓷占比略增加(11%),素胎瓷(1%)、乳浊釉瓷(1%)数量少,另有酱釉瓷、仿龙泉青釉瓷、蓝釉瓷、复合釉色瓷(共计1%)。乳浊釉瓷是新出现的品种,酱釉瓷的数量有一定增加(从3片增至65片)。

青花瓷器类包括碗(31%)、壶(22%)、罐(15%)、盘(14%)、瓶(12%)、盆、炉、器盖、器座、研钵、烛台等(共计6%)。可以看到青花瓷的器物组合整体发生了变化,盘和炉的数量变得非常少;碗类的数量和比重均超过了第一期;瓶、壶、罐数量剧增,壶和罐成为仅次于碗的主要品类。器形方面,新出现大量青花侈口长颈瓶(如标本T14②:59),方唇和粗而长的直颈与第一期的盘口瓶特征相仿,肩颈直径表明其尺寸也与盘口瓶相当,但口沿形态以较平滑的外侈取代了折转盘口。卷沿玉壶春瓶(如标本T14②:53)取代侈口玉壶春瓶大量出现,瓶类的颈部变得斜直,腹部最大径上移,圈足变矮。直领单把壶和小罐的形态渐趋接近,且数量均有增加。盆和盘的沿变宽(如标本T14③:53)。碗类以敞口浅斜曲腹和直口沿内凸为主(如标本T14④:16、T14③:44),且圈足低矮,足墙变宽,侈口碗变少。直口内凸沿的大碗器壁变薄,重心偏向器腹上部。

第二期青花瓷纹饰的图式高度简化,纹饰的层次、图案的结构均趋于简略,绘画笔触粗率,青花呈浅而黯淡的灰绿或褐绿色。碗类纹饰高度简化,敞口的碗类多饰以弦纹,内凸沿的碗类内壁流行两枚一组的简笔点绘花叶纹,以螺旋纹示意花朵或藤蔓。青花罐身牡丹的花

瓣以率性的波浪线勾绘,基本只留花朵,大面积连续布局的缠枝构图趋近消失。瓶类的纹饰简化现象更剧烈。青花玉壶春瓶中,第一期颈部流行的竖线开光在第二期成为主流,但开光内纹饰完全省略,仅存的框线上延至外口沿,成为瓶身上半部装饰的主体,肩部饰以青花直领单把壶和小罐上流行的简笔水波纹(如标本T14④:56)。而第二期的直领单把壶和小罐不仅器形接近,纹饰也基本趋同。

第二期淡青釉瓷的器类包括瓶罐类(31%)、罐(22%)、盆(20%)、壶(15%)、瓶(9%)、碗、研钵、盘、研臼、器盖、杯、缸、瓮、灯盏、盒、炉、烛台(共计3%)。与第一期相比,盆类比例大幅上升,瓶类比例似有所下降。器形方面,罐类新出现一种方唇直口的高直领罐,器身高度为两期各器类之最。盆类中方唇敛口、宽折沿带鋈的大型盆类数量非常多。和青花的情况一样,淡青釉直领单把壶与小罐的形态变得非常接近。瓶类出现一类圆唇直颈的瓶,肩部折转,腹部外鼓,可能与卷沿玉壶春瓶的形态有一定关联。碗类中淡青釉和乳浊釉敞口斜曲腹碗类内底变平,有一周压环。伞形纽平沿子口器盖、灯盏、小杯开始较多地出现。

第二期与第一期相比,素胎器物的占比不变,但总体数量从356件(片)降至228件(片)。素胎器物多为生烧或过烧、釉面剥落非常严重、无法判断其釉色的次品,有的粘有少量釉滴,根据器形判断,应该是脱漏了施釉环节的淡青釉碗盘,总体而言都是生产过程中的残次

品。素胎器物数量的下降,胎釉烧结质量的提高,表明湖广窑第二期生产组织和窑温控制工艺相比第一期有一定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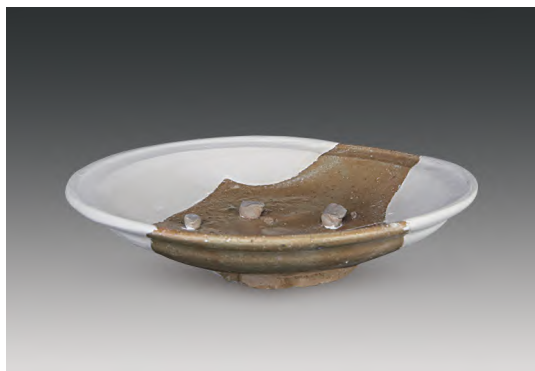
(三)装烧工艺情况

湖广窑区所见窑具按功能可分为装烧具和支垫具。装烧具主要有平顶匣钵和凹顶匣钵,根据匣钵顶部残留的垫圈印痕,以及顶部内侧有粘连青花瓷器口沿的现象,可知两类匣钵均倒扣使用,与龙泉窑的M形匣钵使用方式接近。支垫具中,垫筒口沿部位多生烧,使用时可能倒扣于窑床垫砂上为叠放而成的器物柱提供支撑,因此受热不均。有的垫柱刻有“陈”“何”“仞”等姓氏铭文,通过文字的方向可知垫柱也是平顶向上倒扣使用。第一期器物多采用泥点制的支钉间隔(图四、五),碗盘类叠烧的最下一件用垫圈与匣钵隔开。盘口瓶、玉壶春瓶的内口沿和青花荷叶罐盖的顶面这类特殊部位也发现有支钉叠烧的痕迹。还发现有淡青釉玉壶春瓶底与研臼底部相互粘连的现象。此外,盆类的口沿刮釉、内底有支钉痕、内底粘连盘类残片的现象,说明盆类可能采用对口套烧,内部再装烧其他器类。罐类口沿刮釉处发现有粘连痕迹,也可能采用对口叠烧。

第一期纳入统计的窑具标本总计约2049件(片),器类包括垫筒(60%)、平顶匣钵(16%)、垫柱(13%)、凹顶匣钵(11%)、垫圈、窑撑(共计1%)。第二期纳入统计的窑具标本总计约588件(片),包括垫筒(43.7%)、垫柱(33.1%)、平顶匣钵(13.7%)、凹顶匣钵(4.5%)、垫饼(2%)、垫



图四 青花长柄扁执壶(T21H7②: 62)支钉



图五 青瓷折沿斜曲腹圈足盘(T21H7③: 66)支钉

圈(2%)、平顶矮匣钵(1%)。与第一期相比,第二期的平顶匣钵开始出现器壁较矮、顶径变大的新器形。凹顶匣钵数量锐减。间隔具中新出现了垫饼。

三 结 语

建水窑湖广窑区的发掘获得了有序地层堆积资料和大量遗物,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湖广窑是一处明代早期创烧的生产地点,在创烧伊始便同时进行青瓷、青花瓷的生产。其中,青釉瓷自始至终是其产品的主流。相较于青花瓷,云南地区的青瓷生产,此前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从出土瓷片数量和重量两项指标观察,淡青釉瓷器所占比例最高,暗示了淡青釉瓷器生产在建水窑瓷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瓶、罐、盆等大型器物,是淡青釉瓷器中的主要器类。其采用明火裸烧方式,外壁多有落渣等缺陷,部分器物在生产中很有可能充当了匣钵的角色。这些情况表明淡青釉瓷器为湖广窑生产的普通产品。除淡青釉瓷器外,湖广窑区尚出土有少量仿龙泉窑产品,其工艺较淡青釉产品更为精细,这体现了云南地区瓷业的广采博取。

湖广窑生产的青花瓷具备更活跃的创新性文化因素,其数量、重量比例不高,但胎釉精致、修坯规整、纹饰富于变化,且采用匣钵装烧,体现出精工细作的意图,展现了湖广窑生产的最高工艺水平。同时,青花瓷呈现出较明显的时代变化,第一期产品的胎釉、纹饰质量较高,第二期产品质量明显下滑,纹饰的简化现象尤为突出,青花呈色反映出所用钴料质量亦明显下滑。这可能与明中期以后,更具竞争力的景德镇民窑瓷器生产规模扩大^[26],挤占当地高质量瓷器市场有关。

值得说明的是,建水碗窑遗址生产地点众多,各地点的兴衰节奏并非完全一致,从初步观察来看,各地点可能确如《奉天府清军府明文》碑所言,存在一定的分工。因此,湖广窑出土材料反映的情况或有局限性,不过充分研究这一地点的出土材料,应能为进一步研究建水

窑各个地点之间的兴衰变化、建水窑的特色、建水窑乃至红河流域瓷业发展的阶段性提供重要线索。

- [1] 孙太初《云南西部的火葬墓》,《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 [2] 葛季芳《云南玉溪发现古瓷窑址》,《考古》1962年第2期。
- [3] 葛季芳《云南建水窑的调查和分析》,《考古》1987年第1期。
- [4] 葛季芳、李永衡《云南玉溪古窑遗址调查》,《考古》1980年第3期。
- [5] 杨静荣《元代玉溪窑青花鱼藻纹玉壶春瓶》,《文物》1980年第4期。
- [6] 冯先铭《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冯先铭《有关青花瓷器起源的几个问题》,《文物》1980年第4期。
- [7] 杨大申《关于云南禄丰县元墓出土青花瓶的一点看法》,《考古》1982年第4期。
- [8] 同[3]。
- [9] 元宣光年号共八年,墓志记为“宣光九年”,据葛季芳介绍,概因云南地区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之前一直袭用宣光年号,多用至九年、十年。见葛季芳《禄丰火葬墓及其青花瓷器》,《文物》1984年第8期。
- [10] 葛季芳《禄丰火葬墓及其青花瓷器》,《文物》1984年第8期。
- [11] 施静菲《云南地区青花器的变迁——兼谈其与江西景德镇和越南青花的关联》,(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5期,2008年;王晰博《中国云南与越南古代青花瓷关系初探》,《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
- [12] 苏伏涛《建水窑青花瓷器概述》,《云南文物》1987年第21期,后载《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七,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
- [13] 张建农《云南省建水县碗窑村古窑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8期。
- [14] 陈丽琼、董小陈《建水窑窑调查与探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3辑,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 [15] 张建农《建水城北古瓷片及器物的情况调查》,《云南文物》1989年第25期,后载《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七,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
- [16] 朱云生对此曾有总结,见朱云生《云南建水古窑产品的新发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3辑,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下转第80页)

第 8 期。

- [19] 同[2]。
- [20] 关于都图制的讨论,参见徐茂明《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
- [21] (清)陈澧等修、邓嬭等纂《浮梁县志》卷三《建置志》“津梁”载“镇市都拱辰桥(正统里人刘士护建)、落马桥”,《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八三五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
- [22] 同[1],第 372 页。
- [23] 同[1],第 371 页。
- [24] 实验样品检测与分析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副教授课题组的马仁杰博士进行,谨致谢忱。
- [25] 同[2]。
- [26] 高宪平《明嘉靖祭祀用瓷新探》,《文物》2020 年第 11 期。
- [27] 郑乃章等《明清以来景德镇低温黄釉的初步研究》,《建筑材料学报》2008 年第 4 期。
- [28] 侯佳钰等《明弘治、清康熙黄釉黄彩的无损分析

对比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21 年第 1 期。

- [29] 侯佳钰等《明清宫廷黄釉瓷的科学研究》,《故宫学刊》(总第 23 辑),故宫出版社,2022 年。
- [30] 同[16]。
- [31] 王钰欣《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与陶政》,《清史论丛》(第 3 辑),中华书局,1982 年。
- [32] 清乾隆八年(1743 年)唐英奉旨编写的《陶冶图编次》“成坯入窑”载:“瓷坯既成,装以匣钵,送至窑户家。”引自张发颖主编《唐英全集》(第四册),学苑出版社,2008 年。这说明瓷坯在御器厂完成制作后,再送至邻近的民窑户进行烧造。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发生的“白土案”中,星子县民提道:“御窑制造上用瓷器,亦须配用,例系官窑做成泥坯,仍在民窑分烧成器,并非另有官窑,若民窑无高岭配用,一经停歇,必致贻误。”引自(清)盛元等纂修《南康府志》卷四《地理·物产》“白土案”,《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九八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此条文献则强调御用瓷器完全由民间窑场负责烧成。

(实习编辑:崔 焱)

(上接第 72 页)

- [17] 何芳《“云南青花暨边疆地区青花学术研讨会”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3 期。
- [18] 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第 13 辑,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
- [19] 施静菲《云南地区青花瓷器的变迁——兼谈其与江西景德镇和越南青花瓷的关联》,(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 25 期,2008 年。
- [20] 葛季芳《景德镇瓷器在云南及其影响》,《景德镇陶瓷》1992 年第 2 期。
- [21] 同[19]。
- [2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建水碗窑村建水窑遗址湖广窑区发掘简报》,《文物》本期。
- [23] 如明正统十二年张叔崑墓出土青花螭耳瓶与筒形圈足炉,景德镇丽阳瓷器山 T4②层出土青花

管耳瓶、筒形炉、折腹碗、高足杯,见孙以刚《江西德兴明正统景泰纪年墓葬青花瓷考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 6 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 年;故宫博物院等《江西景德镇丽阳瓷器山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3 期。

- [24] 统计中存在大量瓶罐碎片,难以清楚地辨别器类归属,故均归为瓶罐类。罐、瓶则指能够清晰辨明的瓷片。
- [25] Regina Krah,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and Related Wares, Vietnamese Ceramics: A Separate Tradition,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p.148.
- [26] 秦大树等《落马桥窑址明清遗存发掘的收获及相关问题》,《文物》2020 年第 11 期。

(责任编辑:耿 昀)